

方志视野下的明清上海地区疫情研究*

徐满成 段逸山

提 要：梳理上海地方志特别是旧志关于明清时期疫情的资料，分析明清上海地区疫情特征，发现明清上海地区平均7年就有1次疫情，多在夏秋之交；这一地区疫情重心有从华亭县—上海县区域向上海县—嘉定县区域迁移的趋势；疫情烈度总体较高，以“大疫”为主；病种记载较少，见载的病种以霍乱和红痧为主；上海地区疫情常与他灾害并发。从江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来看，则可以发现上海地区疫情特点与全国和江南地区相呼应，但在清代末期，由于人口和经济重心迁移至从府城华亭县（包括娄县）迁移至上海县，疫情重心也随之转移到上海县。

关键词：地方志 疫 上海地区 明代 清代

上海地区是明清江南地区的组成部分，自明、清至民国，逐渐发展为江南的重心乃至全国的经济重心。与此同时，人口的聚集也带来频繁的疫情。而地方志一般均在“祥异”类卷目中记录疫情，故可从地方志中挖掘涉疫资料，进而研究一地之疫情。

学界关于地方志涉疫资料的研究已有许多成果，主要有以下6个方面：一是宏观分析疫情灾害时空分布情况，并尝试总结大时空尺度上的规律，如龚胜生等参引上万种方志资料，形成《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并探究我国3000年历史中疫灾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①，龚氏和相关学者还梳理了不同朝代全国疫灾地理特征^②，亦有学者分别探讨明、清、民国时期某一省或某一地区的疫情规律^③。具体到上海地区，刘昌森等编著《上海自然灾害史》，对唐代至民国期间包括疫情在内的各类灾害作梳理和分析^④。二是从医疗文化等角度深入挖掘分析单次疫情，如

*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上海府县旧志涉疫资料研究”（项目编号：2020ETQ001）成果。

① 参见龚胜生编著：《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齐鲁书社，2019年；龚胜生、李孜沫、谢海超等：《中国3000年疫灾流行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地理学报》2021年第8期。

② 参见龚胜生、叶护平：《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时空分布规律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3期；龚胜生、刘卉：《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4期；龚胜生、龚冲亚、王晓伟：《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1期；龚胜生、王晓伟、龚冲亚：《元朝疫灾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2期；林欣华：《明代疫灾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张涛：《明代疫灾时空分布及环境机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刘开心：《清代疫灾时空分布特征及其与交通的关系》，广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

③ 关于明代，参见吕金伟：《明清时期海南地区疫灾探略》，《琼州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何欣峰：《明代疫灾应对机制研究》，《中州学刊》2020年第12期；尹阳硕：《明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疫灾与医疗社会》，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关于清代，参见李玥：《清代四川疫灾的时空分布与社会应对》，《长江文明》2021年；闫娜轲：《清代河南灾荒及其社会应对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林竹菊：《清代台湾疫病文献资料研究》，福建中医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关于民国时期，参见王肇磊、王思琪：《民国时期湖北城市疫灾时空分布规律》，《城市史研究》2015年第2期；曹秀丽：《民国时期河南省疫灾时空分布及其社会影响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④ 参见刘昌森、姚保华、章振铨等：《上海自然灾害史》，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年。

余新忠对清代嘉庆道光之际和咸丰同治年间江南大疫的研究,李永生等关于1680年代蟠龙水大疫的病种是炭疽病的判断,以及一批学位论文等。^①三是关于疫情原因的分析,一般认为疫灾是自然生态因素与人类社会环境双重作用的结果,如李玉偿对江南传染病史的研究,单联喆关于天文气候、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与疫灾形成的分析^②。四是对疫病病种的探讨,如张剑光认为唐代后期江南疫病多为伤寒、痢疾、疟疾等;熊益亮分析明清闽北地方文献,认为主要病种有痘疹、麻疹、疟疾、痢疾、麻风、霍乱等。^③五是考量疫情的影响,发现疫情带来大量人口死亡、经济衰退、冲击政治和社会环境等负面影响,但同时也“倒逼”医学进步,促使人们增强卫生意识。^④六是关于防范处置疫情各类措施及其主体的讨论。官府、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都有相应的防疫抗疫举措,学界或认为政府发挥了主导性作用^⑤,或认为社会力量是防控疫情的主体^⑥,或提出民众才是疫灾防治的主要承担者^⑦,亦有认为三方在疫情防控中合力作为、互相弥补者。^⑧

本文所谓“上海地区”,系指今上海市对应的地域,相当于元末松江府(下辖华亭、上海二县)和嘉定州、崇明州一带。明洪武二年(1369)降嘉定、崇明二州为县;嘉靖二十一年

① 参见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余新忠:《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李永生、李连军:《地方志中关于炭疽病的最早记载》,《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2期;单丽:《1902年霍乱在中国的流行》,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张蕾:《1910—1911年东北鼠疫与山东疫情兼论鼠疫在山东流行的环境因素》,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吴寰:《灾疫的流动性:清以降以云南为中心的区域鼠疫流行研究(1644—1949)》,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赵红霞:《瘟疫百年前:1917—1918年绥远鼠疫新探》,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② 参见李玉偿:《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单联喆:《明清山西疫病流行规律研究》,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③ 参见张剑光:《唐代江南的疫病与户口》,《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熊益亮:《明清闽北疫情资料整理与研究》,福建中医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④ 参见张哈、余新波、付鹏等:《明清北京疫情流行研究——以北京地方志为中心》,《医学与哲学》2021年第2期;张崇旺:《明清时期自然灾害与江淮地区社会经济的互动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苏东敏:《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⑤ 参见杨鹏程、黄球:《长沙市历史上的疫灾流行与防治研究》,《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尹娜:《两宋时期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控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肖玄郁:《民国前期(1912—1927)湖南疫灾防治研究》,湖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⑥ 参见刘涛、高金霞:《明代山东的瘟疫与政府应对》,《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罗宝川:《明清时期湖北方志中的疫灾与救治——兼论地方社会治疫能动的内因》,《中国地方志》2020年第5期;吴娅娜:《湖湘疫病史研究》,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苏卫平:《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的疾病与医疗卫生体系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黄礼群:《1927—1937年安庆公共卫生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⑦ 参见魏珂、刘正刚:《清代台湾疫灾及社会对策》,《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5期;张慧芝:《清代太原盆地“辟毒”、“避瘟”民俗的地理解读》,《晋阳学刊》2010年第1期;杨志敏:《明清时期中原地区应对瘟疫民俗活动考述》,《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20年第6期;郭静:《甘肃清代疫灾及其防治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⑧ 参见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徐满成、黄晓华、李文惠等:《上海府县旧志视野下的疫情认知与应对》,《中华中医药杂志》2021年第3期;唐朝丽:《民国时期四川的传染病与社会(1912—1937年)》,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李峰:《山西古代疫情研究》,山西中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1542)析华亭、上海两县之地立青浦县，嘉靖三十二年废，万历元年(1573)复设。直至明末，这一地区共有5县。清顺治十三年(1656)，割华亭县之地建娄县；至雍正二年(1724)、三年分县，析华、娄、上、青、嘉之地增置奉贤、金山、南汇、福泉、宝山5县，福泉县旋于乾隆八年(1743)并归青浦县；嘉庆十五年(1810)，划上海县、南汇县之地立川沙抚民厅，自此至清末10县1厅的行政区划保持稳定。^①为考察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疫情，本文主要从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牵头出版的“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包括松江府卷和松江府县卷、上海县卷、崇明县卷、嘉定县卷、青浦县卷、奉贤县卷、金山县卷、南汇县卷、宝山县卷、川沙县卷共11卷，含府志、县志及相关附录共88卷)挖掘涉疫资料，梳理形成明清上海地区疫情年表，并从中挖掘明清上海地区疫情的时空分布特征、疫情烈度、病种记载以及与其他灾害的关系。

一 观察指标

根据方志中的疫情资料，编制成明清上海地区疫情年表。提取年表等资料中的数据，可分析明清上海地区疫情的时间、空间、烈度、病种等特征以及与其他灾害的相互关系。主要使用以下指标：

10年疫灾指数，该指数由龚胜生提出，即连续10年内发生疫灾的年数，认为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疫灾的变化趋势^②。本文借用于在时间维度上观测上海地区疫情的宏观趋势。

疫年比。某一段时间内，某行政单位或地区(本文为县或整个上海地区，下同)发生疫情的年数与该行政单位或地区在这一时期存续总年数的百分比，可在时间维度上观测该行政单位或地区疫情发生的频率。

疫县比。某地区(本文为上海地区)范围内，某一年发生疫情的县(元代嘉定、崇明两州均按县计)占该地区总县数的百分比，用于空间维度上观测该地区发生疫情的范围。

烈度。旧志关于疫情的记载，一般有“疫”和“大疫”两种表述，此外对一些特别重大、死亡人数较多的疫情还有“死者无算”“死者相枕藉”等描述。本文参考孙关龙、单丽、王晓琳等的分级方法^③，结合上海地区实际情况，按覆盖地域范围、破坏力等因素将疫情的烈度分为3个等次，用于观测疫情的严重程度：旧志记为“疫”的，一般定为1度；旧志记为“大疫”的，一般定为2度；无论“疫”或“大疫”，有“死者无算”“民死几半”等惨烈死亡程度描述的，抑或存在一县疫情跨越两个乡及以上，或同时影响一个县城和一个乡及以上等情况者，均视为特大疫，烈度定为3度。

平均烈度。若干次疫情烈度的平均值，既有时间维度又有空间维度：时间维度上的平均烈度为单一行政单位或地区在某一段时间内历次疫情烈度的平均值(未发生疫情的年份不参与计

① 参见方岳贡修、陈继儒纂：崇祯《松江府志》卷2《沿革》，“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4—67页；宋如林修，孙星衍等纂：嘉庆《松江府志》卷1《疆域志·列代沿革》，“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5—96页；程国栋修：乾隆《嘉定县志》卷1《疆域志·建置》，“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98页；吴桓修：嘉庆《嘉定县志》卷1《建置考一·建县》，“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第1409页。

② 参见龚胜生：《湖北瘟疫灾害的时空分布规律：770BC~AD1911》，《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411—417页；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第870—878页。

③ 参见孙关龙：《中国历史大疫的时空分布及其规律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04年第6期；单丽：《从方志看中国霍乱大流行的次数——兼谈霍乱首次大流行的近代意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1期，第146—158页；王晓琳、禹思宏：《陕西古代疫情研究——以陕西地方志为中心》，《中医文献杂志》2019年第2期，第13—17页。

算)；空间维度上的平均烈度指某段时间内，某地区范围内各疫县的疫情烈度平均值（未发生疫情的县不参与计算）。该指标结合相同时间或空间内各次疫情烈度中位数指标，用于观察不同时间或不同空间内疫情的总体烈度。

总平均烈度指数。由于空间维度上的“平均烈度”指标在计算过程中未考虑没有发生疫情的县，故提出“总平均烈度指数”以作补充，仅限于在单个年份中计算。

$$\begin{aligned} \text{总平均烈度指数} &= \text{疫县烈度均值} \times \text{疫县占比} \\ &= \text{疫县烈度和} \div \text{总县数} \end{aligned}$$

该指数为某年疫县的疫情平均烈度与疫县比的乘积，亦即某年各疫县疫情烈度之和除以总县数所得的商，相当于把各疫县疫情烈度平摊在所有县上。用于综合考察某一地区全境的某年疫情烈度和覆盖范围。

二 时间分布

根据上海疫情年表，可以分析历史上上海地区疫情的时间分布情况，并尝试从中挖掘出若干特点和规律。

（一）总体趋势

明清时期上海最早的疫年记载是1454年，最晚是1910年，前后跨越457年。其中有疫情记录的年份为63年，占13.79%，相当于平均每7年多就有1次疫情。

引用“10年疫灾指数”分析457年间上海地区疫情发生和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15世纪及以前疫情相关记载较少，16世纪和17世纪相对增多，出现“小高峰”，18世纪相对较少，19世纪又呈现增多趋势，且在1883年至1892年的10年间达到顶点，其间有疫情记录的年份竟达6年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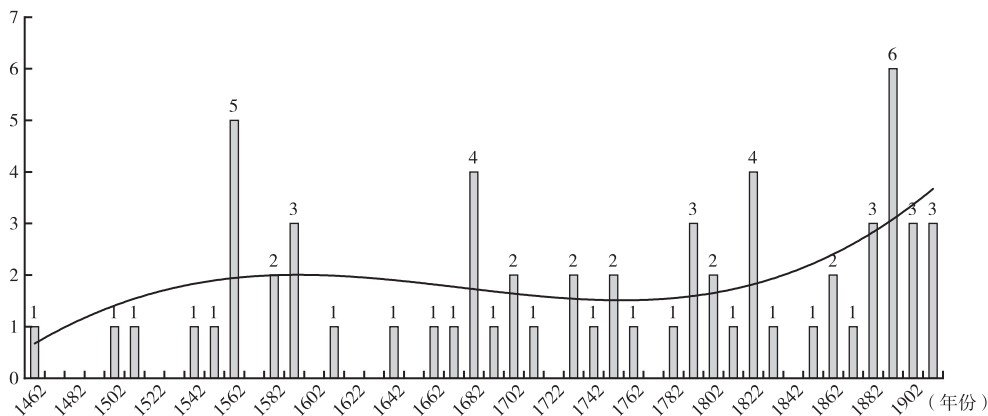


图1 上海地区“10年疫灾指数”变化

关于这一趋势，其原因是多样的。其一，明清时期修志之风渐盛，至清代达到高峰^①，故明代后期及清代疫情记载较为详细，而明代前期疫情记载则相对较少。其二，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有逐渐增多、进而形成人口聚集区的趋势。而人口聚集正是疫病传播的重要条件，也

^① 参见陈蔚松：《元明清一统志馆及其修志成就》，《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因此出现疫情“越来越多”的趋势。其三，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文化重心总体有由西往东、由北向南的迁移趋势^①，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明清时间松江一带的人口聚集效应，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疫情的发生。

（二）季节特点

上海方志中部分疫情记载有季度或者月份记载，根据这类内容可以分析出疫情好发季度或月份。有的条目直接记录“某年，七月，疫”，则记为“七”；有的条目直接记录“某年夏，大疫”，则记为“夏”；有的条目记录“夏秋之交”，则分别记为“六”“七”。经梳理、去重，共有涉“疫”月份记载27次，涉“疫”季度记录61次，其分布如图2。可见，夏季是疫情最常发生的季节，其次为秋季；从月份来看，农历六月、七月为高发期，正是“夏秋之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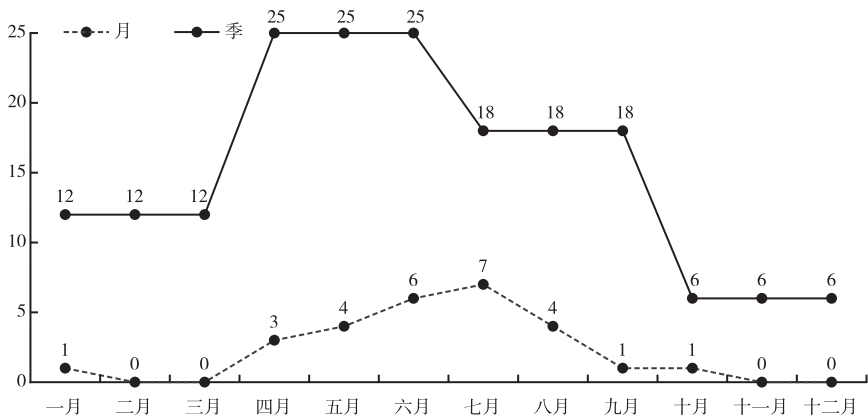


图2 上海地区疫情发生季度和月份分布

三 空间分布

以县域为单位，可以考察上海地区各县疫情爆发趋势，分析历年疫情影响范围，推测单次疫情传播路径，进而研究上海疫区重心迁移的情况。

（一）各县疫情爆发趋势

表1 各县疫年数（1454—1932年）

县（厅）	嘉定	上海	青浦	宝山	南汇	川沙	华亭	娄县	崇明	金山	奉贤
疫年数	36	28	20	12	11	9	7	6	5	4	4

经统计，上海地区各县疫年数如表1所示，各县不同时期的方志对相同年份疫情记载多有重复，本次统计只计为1年。可见，旧志中关于嘉定县疫年记录最多，但因为各县设立时间有别、修志频度不一、记录详略各异，该县是否确系历史上疫情高发区仍需进一步分析：这三个干扰因

^① 参见王欣、吴殿廷、肖敏：《产业发展与中国经济重心迁移》，《经济地理》2006年第6期；韩茂莉：《论北方移民所携农业技术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4期；鲍成志：《区域经济变迁与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演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朱子彦：《从文化重心南移看南方士大夫集团优势地位的确立》，《人文杂志》2013年第4期。

素中，修志频度虽然不一，但明清县志修撰主要取决于府州统一指令安排，总体上基本同步，至于部分县修志而其他县未修，主要反映在同治光绪年间统一修志之后的二三十年内，相对本研究中总体400余年的跨度影响不大；各志记录虽有详略之分，但基本上对“疫”“大疫”作了记载，可以支撑本节的进一步研究；因此，造成干扰的主要因素仍在于各县成立时间不同，导致“古县非今县”带来的差异。为此，将1454至1910年这457年按县域变化情况划分为3个时期，即：

明代中期：1454—1541（青浦立县之前），共88年。此阶段上海地区共有4县（华亭、上海、嘉定、崇明）。

明末清初：1542（青浦立县）—1724（雍正分县，析出奉贤、金山、南汇、福泉4县。福泉县旋又并回青浦县，忽略不计），共183年。按5县计，即前4县基础上加青浦县；1656年华亭县析出娄县，但直至1724年，娄县只有1个疫年。为便于分析，仍按华亭县计。

清代中后期：1725（雍正分县，析出宝山县）—1910（清末），共186年。按11县计。川沙抚民厅立于1805年，为便于分析，这一阶段不再拆分，但在计算川沙抚民厅相关数据时，其存续年数按107年计。

通过分析3个时期的各县疫年比，来观测各县疫情发生的频率。经统计，明代中期、明末清初、清代中后期各县疫年比分别如表2、表3、表4所示：

明代中期，4县平均疫年比为2.3%，上海县（3.4%）最高、崇明县（0.0%）最低。

明末清初，各县平均疫年比为3.5%。高于平均值的两县是嘉定县（6.6%）和上海县（4.4%），崇明县仍是最低（1.6%）。

清代中后期，各县（厅）平均疫年比为5.2%。最高仍是嘉定县（11.8%），相当于每9年就有1次疫情；其次是上海县（9.1%），几乎十年一遇；平均疫年比以上的还有川沙抚民厅（8.4%）、青浦县（8.0%）、宝山县（5.9%）和南汇县（5.9%）；以华亭、崇明两县为最低，仅1.1%，不足嘉定县的一成，相当于90年才会爆发1次。

总体来看，从明代中期到明末清初，再到清代中后期，疫区重心有从华亭—上海区域向上海—嘉定区域迁移的迹象。而上海地区各县平均疫年比从2.3%到3.5%，再到5.2%，有逐渐上升的趋势，表示疫情爆发越来越频繁。唯崇明县的疫年比一直最低。

表2 明代中期（1454—1541）各县疫年分析

县	上海	华亭	嘉定	崇明	平均
疫年	3	2	2	0	1.8
疫年比	3.40%	2.30%	2.30%	0.00%	2.00%

表3 明末清初（1542—1724）各县疫年分析

县	嘉定	上海	青浦	华亭*	崇明	平均
疫年	12	8	5	4	3	6.4
疫年比	6.60%	4.40%	2.70%	2.20%	1.60%	3.50%

说明：华亭县含娄县数据

表4 清代中后期（1725—1910）各县疫年分析

县(厅)	嘉定	上海	川沙*	青浦	宝山	南汇	娄县	奉贤	金山	崇明	华亭	平均
疫年	22	17	9	15	11	11	5	4	4	2	2	9.3
疫年比	11.80%	9.10%	8.40%	8.00%	5.90%	5.90%	2.70%	2.10%	2.10%	1.10%	1.10%	5.20%

说明：川沙抚民厅在这一时期存续时长为107年。计算疫年比时，总年数按107年计

（二）历年疫情影响范围

切换一个视角，以上海地区为整体，横向考察同一年份发生疫情的县域数量，则可说明该年疫情的影响范围。从表5可以看出，历史上的上海地区多为单个县域内发生疫情，但也有多次波及多个县域的大疫，以1756年、1820年、1821年3个年份为最甚，均影响8个县。

表5 不同影响范围的疫情年数统计

疫情覆盖县数	1	2	3	4	5	6	7	8	总计
年数(%)	35 (55.6%)	9 (14.3%)	7 (11.1%)	4 (6.3%)	3 (4.8%)	1 (1.6%)	1 (1.6%)	3 (4.8%)	63 (100.0%)
备注(年)					1733 1749 1849	1855	1862	1756 1820 1821	

考虑上海地区各县曾经历多次拆分，不同时期县的数量不同，单纯依靠发生疫情的县的数量不能很好地进行前后比较，遂同时引入“疫县比”指标来协助分析，如表6所示，发现1510年（75%）、1680年（67%）、1756年（80%）、1820年（73%）、1821年（73%）、1855年（55%）、1862年（64%）等年份疫情波及一半以上的县，影响范围较广。

表6 不同年份的疫情影响范围分析

年	疫县数	疫县比	年	疫县数	疫县比	年	疫县数	疫县比	年	疫县数	疫县比
1454	2	50%	1642	2	33%	1756	8	80%	1863	4	36%
1495	1	25%	1662	1	17%	1777	1	10%	1880	1	9%
1510	3	75%	1663	1	17%	1784	1	10%	1881	3	27%
1539	1	25%	1677	2	33%	1785	1	10%	1882	3	27%
1545	1	20%	1678	2	33%	1786	2	20%	1884	1	9%
1553	1	20%	1679	1	17%	1795	1	10%	1885	4	36%
1554	1	20%	1680	4	67%	1796	1	10%	1886	1	9%
1555	1	20%	1687	1	17%	1806	1	9%	1888	1	9%
1557	1	20%	1696	1	17%	1816	1	9%	1889	4	36%
1562	1	20%	1697	2	33%	1820	8	73%	1890	3	27%
1575	1	20%	1709	1	17%	1821	8	73%	1895	3	27%
1579	1	20%	1728	2	20%	1822	1	9%	1901	1	9%

(续表)

年	疫县数	疫县比	年	疫县数	疫县比	年	疫县数	疫县比	年	疫县数	疫县比
1583	1	20%	1730	1	10%	1823	1	9%	1902	3	27%
1588	2	40%	1733	5	50%	1849	5	45%	1903	3	27%
1590	2	40%	1749	5	50%	1855	6	55%	1910	1	9%
1609	1	20%	1750	1	10%	1862	7	64%			

(三) 单次疫区迁移与疫情传播

对照各县旧志记载,可以发现具体年份中疫区迁移现象,由此可推测当年疫情的传播路径。

明正德五年(1510)四月,嘉定县发生大疫,“横尸填河,不可以舟”“横尸比户,十室八空”^①。至六月,松江出现风灾,华亭县发生疫情,“死者无算”^②;同时上海县大疫,“民死几半”“疫死无算”^③。从中可以发现四月至六月疫情由嘉定向松江府的华亭、上海一带传播的痕迹。

万历十六年(1588)春,上海县大疫,“民死无算”^④。是年夏秋,嘉定县疫,“死者相枕藉”^⑤。据此推测疫情又由上海县传播至嘉定县。

崇祯十五年(1642)春,嘉定县大疫,“僵尸填沟塞道,四郊掘坎不暇掩”^⑥。是年崇明县也见“大疫”,未载具体月份。^⑦ 疫情或有从嘉定县传播至崇明县的可能。

清乾隆十四年(1749)夏,青浦县大疫^⑧;夏秋,嘉定县大疫^⑨;九月,宝山县大疫,冬至后方才平息。^⑩ 自青浦而嘉定至宝山,疫区变迁非常明显,体现了疫情的传播方向。当年上海县

① 杨旦修,浦南金纂:嘉靖《嘉定县志》卷第9《杂志·灾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9页;韩浚修,张应武等纂:万历《嘉定县志》卷17《杂记考上·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39页;赵昕修,苏渊纂:康熙《嘉定县志》卷3《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77页;程国栋纂修:乾隆《嘉定县志》卷3下《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第1086、1951页。

② 陈威修,顾清纂:正德《松江府志》卷32《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93页;聂豹修、沈锡等纂:正德《华亭县志》卷16《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24页。

③ 郑洛书修,高企纂:嘉靖《上海县志》卷6《杂志》,“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42页;陈方瀛修,俞槩纂:光绪《川沙厅志》卷14《杂记志·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川沙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88页。

④ 王大同等修,李林松纂:嘉庆《上海县志》卷19《志余·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313页。

⑤ 程国栋修:乾隆《嘉定县志》卷3下《赋役志·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第1088页。

⑥ 赵昕修,苏渊纂:康熙《嘉定县志》,卷3《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第480页。

⑦ 参见朱衣点修,吴标等纂:康熙《崇明县志》卷7《浸祥志·浸祥》,“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崇明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53页。

⑧ 参见杨卓修,王昶纂:乾隆《重修青浦县志》卷38《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青浦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68页。

⑨ 参见程其珏修,杨震福等纂:光绪《嘉定县志》卷5《赋役志下·祝祥》,“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957页。

⑩ 参见梁蒲贵等修,朱延射等纂:光绪《宝山县志》卷14《志余·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宝山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26页。

和南汇县也发生了疫情，但未载具体月份或季节。

乾隆二十一年（1756）是大疫年，8个县相继发生疫情。春季，嘉定、宝山两县同时大疫①；春夏，青浦县大疫②；夏季，上海、南汇两县大疫③；具体到夏末的六月，华亭、娄县大疫④；当年崇明县也爆发大疫，“多死亡”⑤，但未载具体月份或季节。可以看出，疫情从嘉定、宝山向南传播，经青浦，至上海、南汇，进而到华亭、娄县。

嘉庆二十五年（1820）、道光元年（1821），均有8个县发生大疫。1820年夏，奉贤县首先爆发疫情，“须臾不救，有一家伤数口者”⑥；尔后入秋，金山、娄县、上海、川沙、青浦、嘉定诸县（厅）均爆发大疫⑦；另外南汇县也是“疫疠大行”⑧，但无具体季节记载。次年夏，上海、川沙、娄县、青浦诸县（厅）再次爆发大疫，复见“有一家丧数口者”⑨；夏秋，宝山县大疫⑩；

- ① 参进程其珏修、杨震福等纂：光绪《嘉定县志》卷5《赋役志下·祀祥》，“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第1957页；梁蒲贵等修、朱延射等纂：光绪《宝山县志》卷14《志余·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宝山县卷，第726页。
- ② 参见杨卓修，王昶纂：乾隆《重修青浦县志》卷38《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青浦县卷，第968页。
- ③ 参见应宝时等修，俞樾等纂：同治《上海县志》卷30《杂记一·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142页；严伟等修、秦锡田纂：民国《南汇县续志》卷22《杂志·祥异补遗》，“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南汇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376页。
- ④ 参见谢庭薰修，陆锡熊纂：乾隆《娄县志》卷15《祥异志》，“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01页；冯鼎高等修，王显曾等纂：乾隆《华亭县志》卷16《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04页。
- ⑤ 赵廷健纂修：乾隆《崇明县志》卷13《祀祥志·祀祥》，“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崇明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85页。
- ⑥ 博润修，姚光发等纂：光绪《松江府续志》卷39《祥异志》，“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60页；韩佩金修，张文虎纂：光绪《重修奉贤县志》卷20《杂志·灾祥》，“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奉贤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67页。
- ⑦ 参见博润修，姚光发等纂：光绪《松江府续志》卷39《祥异志》，“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第10册，第1060页；龚宝琦等修，黄厚本纂：光绪《金山县志》卷17《志余·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金山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46页；汪厚坤等修，张云望纂：光绪《娄县续志》卷12《祥异志》，“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351页；应宝时等修，俞樾等纂：同治《上海县志》卷30《杂记一·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2142页；陈方瀛修，俞樾纂：光绪《川沙厅志》卷14《杂记志·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川沙县卷，第393页；汪祖绶等修、熊其英等纂：光绪《青浦县志》卷29《杂记上·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青浦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686页；程其珏修、杨震福等纂：光绪《嘉定县志》卷5《赋役志下·祀祥》，“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第1959页。
- ⑧ 金福曾等修、张文虎纂：光绪《南汇县志》卷22《杂志·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南汇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83页。
- ⑨ 应宝时等修，俞樾等纂：同治《上海县志》卷30《杂记一·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2142页；陈方瀛修，俞樾纂：光绪《川沙厅志》卷14《杂记志·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川沙县卷，第393页。并参见汪厚坤等修，张云望纂：光绪《娄县续志》卷12《祥异志》，“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第1351页；汪祖绶等修、熊其英等纂：光绪《青浦县志》卷29《杂记上·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青浦县卷，第1686页。
- ⑩ 参见梁蒲贵等修、朱延射等纂：光绪《宝山县志》卷14《志余·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宝山县卷，第728页。

入秋后，嘉定县大疫^①；另有华亭县大疫，金山县瘟疫时行，但未载季度。^②这两年的疫情爆发，均有自南向北传播的趋势。实际上，从更大范围的江南地区来看，这两年的疫情并不独立，而是一次影响时间极长、波及范围极广的真性霍乱大流行。^③

光绪十五年（1889），亦见南汇县夏季大疫及上海、青浦、嘉定3县秋季大疫变迁路径。^④

四 烈度分析

经统计，1454年至1910年间的142县次疫年记录中，疫情烈度为1度的有27次（18.1%），2度95次（63.8%），3度20次（13.4%）。可见旧志的记载中，“大疫”占据了主要地位。

（一）历年疫情烈度

表7呈现历年各县疫情烈度的具体情况，按该表计算出历年疫情平均烈度，得图3。从中可见特大疫“扎堆”的时期，如1545—1555年间的有3年特大疫，尤其是上海县在1554年、1555年两年持续爆发的特大疫情，“民死殆半，六门出柩车，日以百计。棺肆不能给，多以苇席裹尸。亦有一家数尸相枕藉，无人收敛者”^⑤，十分惨烈；1889—1902年间，亦有3年疫情平均烈度超过2.0。由于图3中各年疫情平均烈度由疫县的疫情烈度计算而来，没有考虑未发生疫情的县，故应用总平均烈度指数以补充考察。结合图3所示历年疫情平均烈度，以及表6所示疫县比，得出历年总平均烈度指数，如图4所示。

表7 历年各县疫情烈度示意

年份	华亭	上海	嘉定	崇明
1454	3	2		
1495		2		

- ① 参见程其珏修、杨震福等纂：光绪《嘉定县志》卷5《赋役志下·襁祥》，“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第1959页。
- ② 参见杨开第修、姚光发等纂：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卷23《杂志上·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65页；龚宝琦等修，黄厚本纂：光绪《金山县志》卷17《志余·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金山县卷，第646页。
- ③ 参见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
- ④ 参见严伟等修、秦锡田纂：民国《南汇县续志》卷22《杂志·祥异补遗》，“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南汇县卷，第1370页；吴馨修，姚文楠等纂：民国《上海县续志》卷28《杂记一·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76页；吴馨等修，姚文楠纂：民国《上海县志》卷1《纪年》，“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78页；于定等修，金咏榴等纂：民国《青浦县续志》卷23《杂记上·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青浦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063页；陈传德等修，黄世祚等纂：民国《嘉定县续志》卷3《赋役志·灾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08页。
- ⑤ 宋如林修，孙星衍等纂：嘉庆《松江府志》卷80《祥异志》，“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第8册，第1869页；颜洪范修，张之象等纂：万历《上海县志》卷10《杂志·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34页；李文耀修，叶承等纂：乾隆《上海县志》卷12《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784页；王大同等修，李林松纂：嘉庆《上海县志》卷19《志余·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312页；应宝时等修，俞樾等纂：同治《上海县志》卷30《杂记一·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2136页。

(续表)

年份	华亭		上海		嘉定	崇明
1510	3		3		3	
1539					2	
1542①			青浦			
1545					3	
1553②					2	
1554			3			
1555			3			
1557			2			
1562					1	
1573③			青浦			
1575					1	
1579					2	
1583					2	
1588				3	3	
1590			2			1
1609					2	
1642					3	2
1656		娄县④				
1662				2		
1663				2		
1677			2	2		
1678	2	2				
1679	1					
1680	2		2		2	2

①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析华亭、上海两县立青浦县。

② 明嘉靖三十二年废青浦县。

③ 明万历元年(1573)复立青浦县。

④ 清顺治十三年(1656),割华亭建娄县。

(续表)

年份	华亭		娄县		青浦	上海			嘉定		崇明
1687						1					
1696									1		
1697					1				3		
1709					1						
1724①		奉贤		金山			南汇				
1725②									宝山		
1728				2	1						
1730									2		
1733					1	2	3	2	1		
1749					2	2	2	2	2		
1750									1		
1756	2		2		2	2	2	2	2	2	2
1777									2		
1784							2				
1785									1		
1786					2				2		
1795									1		
1796											2
1805③							川沙				
1806									1		
1816									3		
1820		3	2	2	2	2	2	2	2		
1821	2		2	1	2	3	2		2	2	
1822									2		

① 清雍正二年(1724),析华亭立奉贤,分娄县设金山,裂上海建南汇,割青浦置福泉。乾隆八年(1743)福泉县并回青浦县,各志未专门记录福泉县疫情,故本表不载该县。

② 雍正三年,析嘉定东境置宝山县。

③ 清嘉庆十年(1805),划上海、南汇两县之地立川沙抚民厅。

(续表)

年份	华亭	奉贤	娄县	金山	青浦	上海	川沙	南汇	嘉定	宝山	崇明
1823								1			
1849		2			2	2	2	2			
1855			2		2	2	2	2	2		
1862		2	2	2		2	2	2	2		
1863		2				2	2	2			
1880							2				
1881					1	1			1		
1882					2	2			2		
1884									1		
1885					2			2	1	1	
1886							2				
1888									2		
1889					2	3		3	2		
1890						1			1	3	
1895					2	3			2		
1901									1		
1902					3		2		2		
1903						2			2	2	
1910						1					

说明：表内数字表示相应的县在当年疫情的烈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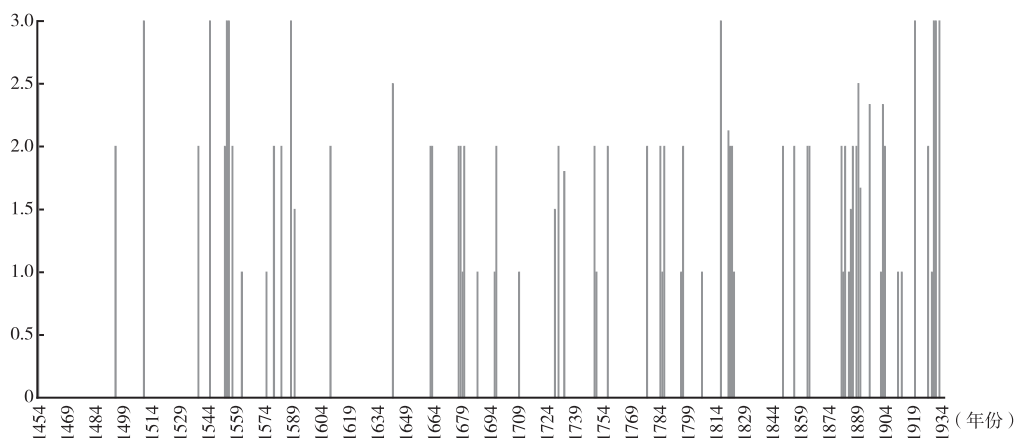


图3 上海地区历年疫县的疫情平均烈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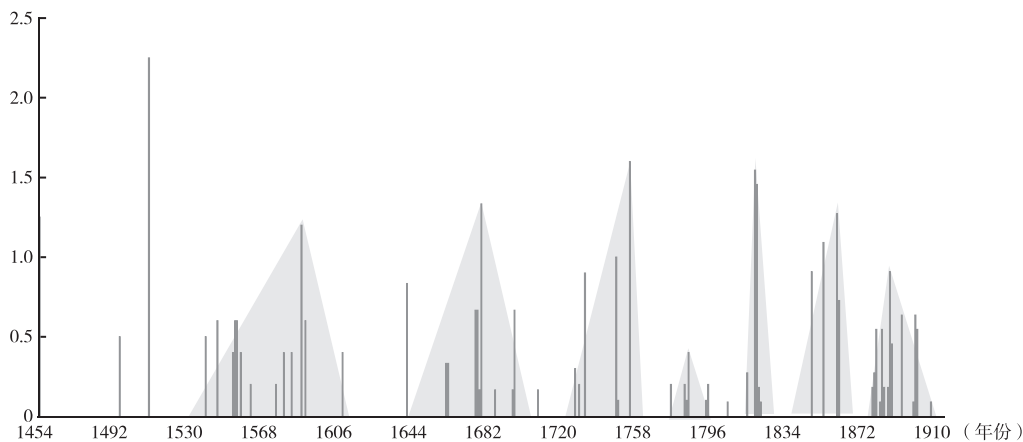


图4 历年总平均烈度指数

从大的趋势来看上海地区全境总平均烈度指数，除1510年波及3县的特大疫情在图中畸高外，其他时间呈现出先升后降的总体趋势。1756年为峰值年，华亭、娄县、上海、青浦、南汇、嘉定、宝山、崇明8县均发生大疫，几乎覆盖上海地区全境，唯有奉贤和金山2县幸免。

细分之下，则可发现若干个疫情集中爆发、总平均烈度指数升而复降的阶段。一是1545—1609年，在1588年达到峰值，是年上海、嘉定2县大疫，“民死无算”^①；二是1662—1709年，于1680年达到峰值；三是1728—1756年，总平均烈度指数逐年攀升，于1756年到顶点后骤然回落；四是1777—1786年间的小爆发；五是1816—1823年间的剧烈爆发，尤其是1820年、1821年间的霍乱大流行；六是1849—1863年间的集中爆发，尤以1862年为甚；七是1880—1910年，此间总平均烈度较前为低，但疫年非常频繁，1889年总平均烈度达到峰值，上海、青浦、南汇、嘉定4县大疫，“邑多死亡”^②。而每两个阶段之间，一般有二三十年各县均无疫情，仅从疫情的角度来说，这是难得的太平岁月。

（二）各县疫情烈度

各县（厅）疫情平均烈度如表8所示：奉贤县疫情的平均烈度最高，为2.25度，即该县每次发生疫情烈度均为2度以上，且四次中有一次为3度；其他平均烈度超过总平均水平的县（厅）有华亭、上海、南汇、川沙和娄县；崇明、青浦、嘉定、金山等县疫情平均烈度较低。

参照前文“明代中期”“明末清初”“清代中后期”的划分，分别计算每一个时期疫情平均烈度，得表9、表10、表11，从中可以看出各个时期的疫情烈度特征。

① 王大同等修，李林松纂：嘉庆《上海县志》卷19《志余·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1313页；赵昕修，苏渊纂：康熙《嘉定县志》卷3《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第478页。

② 吴馨修，姚文楠等纂：民国《上海县续志》卷28《杂记一·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2776页；严伟等修，秦锡田纂：民国《南汇县续志》卷22《杂志·祥异补遗》，“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南汇县卷，第1370页。并参见吴馨等修，姚文楠纂：民国《上海县志》卷1《纪年》，“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2878页；于定等修，金咏榴等纂：民国《青浦县续志》卷23《杂记上·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青浦县卷，第2063页；陈传德等修，黄世祚等纂：民国《嘉定县续志》卷3《赋役志·灾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第2808页。

表8 各县疫情平均烈度

县	奉贤	华亭	上海	南汇	川沙	娄县	嘉定	崇明	青浦	宝山	金山	总平均
平均烈度	2.25	2.14	2.11	2.09	2	2	1.89	1.8	1.8	1.75	1.75	1.95

表9 明代中期(1454—1541)各县疫情平均烈度

县	华亭	嘉定	上海	总平均
平均烈度	3	2.5	2.33	2.57

说明：这一时期崇明县未见疫情记录

表9说明，明代中期，华亭县疫情烈度最高，平均为3度，即这一时期两次疫情均为特大疫。上海、嘉定两县平均烈度也在2.0—2.5度之间，唯崇明县无疫情记载。总平均烈度为2.57度，各次疫情烈度中位数为3度，反映明代中期上海地区疫情烈度极高。

表10 明末清初(1542—1724)各县疫情平均烈度

县	上海	嘉定	华亭(含娄县)	崇明	青浦	总平均
平均烈度	2.25	2.08	1.75	1.67	1.6	1.97

表10显示，明末清初，上海县疫情烈度最高，平均为2.25度，即此间8次疫情均为大疫，且有两次属于特大疫；嘉定县亦达2.08度；相对最低的是青浦县，平均烈度为1.60度，这也说明该县历次疫情仍以大疫为主。这一时期总平均烈度为1.97度，中位数为2度，说明仍以大疫为主。

表11 清代中后期(1725—1911)各县疫情平均烈度

县	奉贤	南汇	崇明	娄县	川沙	上海	华亭	青浦	宝山	金山	嘉定	总平均
平均烈度	2.25	2.09	2	2	2	2	2	1.87	1.75	1.75	1.73	1.9

表11表明，清代中后期，以奉贤县为最高，平均烈度达2.25度；南汇县以2.09度居其次；华亭、娄县、上海、川沙、崇明5县(厅)疫情平均烈度都是2度；最低是嘉定县，平均烈度1.73度，说明即使是平均烈度最低的县域，亦是大疫为主。总平均值1.91度，较前有所下降，中位数仍是2度，在这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仍是大疫。总体来看，从明代中期到明末清初，再到清代中后期，整体疫情烈度有逐渐下降趋势。

为进一步分析不同时期各县疫情发生频率和烈度的差异，仍按上文划分的明代中期、明末清初、清代中后期分别研究。以各县疫年比为横坐标，以各县疫情平均烈度为纵坐标，取平均疫年比和总平均烈度交叉点为原点，划分4个象限，形成疫年数与平均烈度散点分布图，即可直观地呈现出各县差异。

图5说明，明代中期发生疫情的3县中，上海县属于疫年相对多但烈度相对低的，而华亭县疫年相对少但烈度相对高，嘉定县则是疫年相对少且烈度相对低的。崇明县未发生疫情，故标于(0,0)点作为对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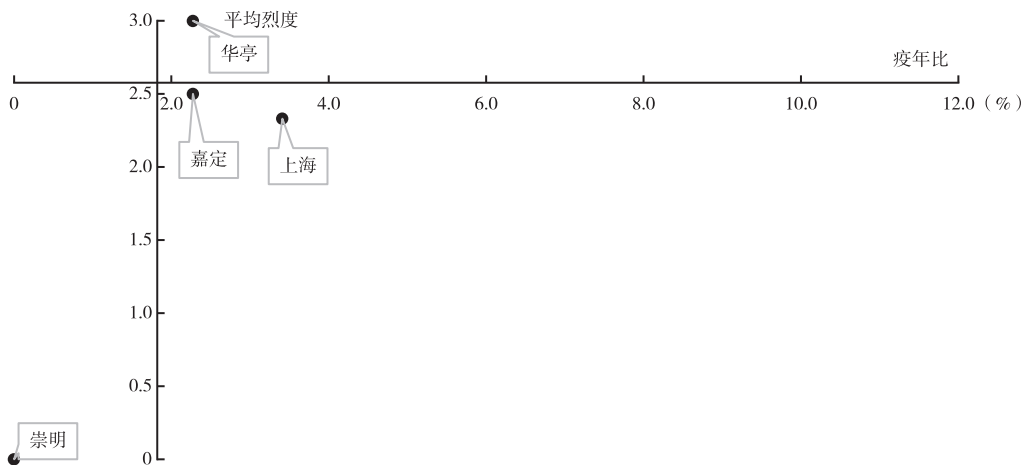


图5 明代中期（1454—1541）各县疫年数与疫情平均烈度四象限散点分布

图6中，明末清初诸县疫情呈现“两极分化”现象，嘉定、上海两县疫年相对多且烈度相对高，华亭（含娄县）、青浦、崇明等县疫年相对较少而且烈度也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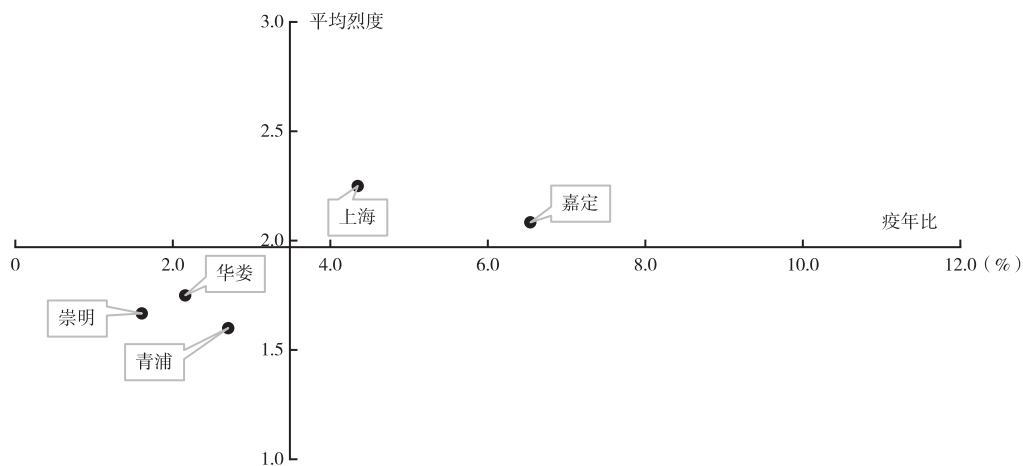


图6 明末清初（1542—1724）各县疫年数与疫情平均烈度四象限散点分布

图7表明，清代中后期，上海、川沙、南汇3县（厅）是疫年相对多且烈度相对高的区域，嘉定、青浦、宝山3县疫年相对多但烈度相对较低，奉贤、华亭、娄县疫年相少但烈度相对较高，唯独金山县疫年相对较少且烈度也相对低。

（三）总体疫区重心变迁趋势

表7不仅能呈现各县（厅）历年疫情的烈度，还和图5、图6、图7一同展现了上海疫情重心的总体变化趋势：终明一朝，上海地区的疫情重心在县域上有从华亭县—上海县区域向上海县—嘉定县区域迁移的趋势。清代无论雍正分县前后，青浦、上海、嘉定3县都是疫情高发的重要地区。分县后由这些县分割出的南汇、川沙、宝山等县（厅），亦有较多疫情发生。相较之下，华亭县及其析出的娄县、奉贤、金山等县，疫情均较少，特别是1863年以后，更出现疫情零记录的大片空白。由此可见，这一时段基本维持了明代疫情重心转移至上海—嘉定地区的结局，但上海县的疫情烈度较嘉定县更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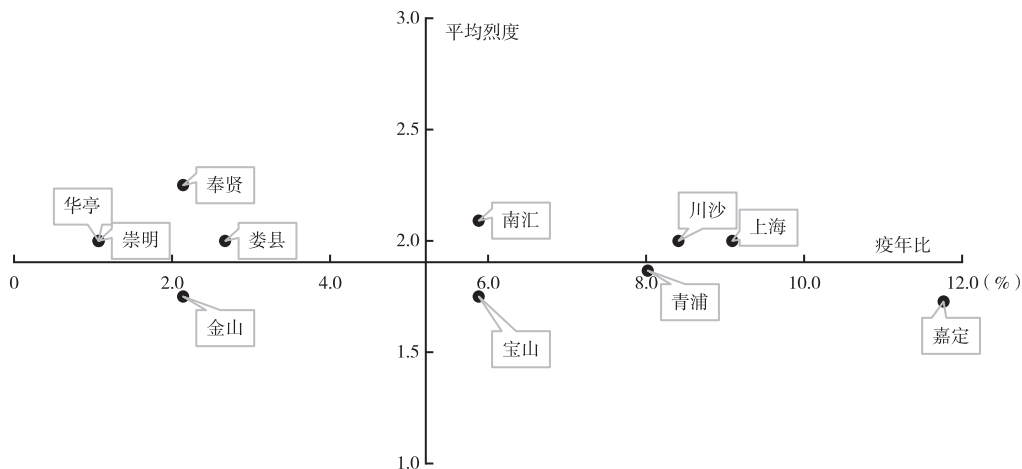


图7 清代中后期（1725—1911）各县疫年数与疫情平均烈度四象限散点分布

五 病种记载及与其他灾害的关系

上海府县旧志关于疫病病种记载较少，目前仅见有具体年份的明确疫病记载 12 则（不同志书记载的同年同县疫病病种只计 1 则），详见表 12。其中明确称霍乱者 5 则，红痧占 3 则，虾蟆瘟、蜘蛛瘟、喉痧、鼠疫各占 1 则。此外，另有 1 则提到上海县 1895 年“大疫，患吐泻，死亡甚多”^①，虽仅 9 字，但从其所述症状和危害性来看，再结合当时的传染病背景，亦推测为霍乱。实际上，霍乱确实是当时较为流行的病种，咸丰同治年间江南大规模瘟疫，主要病种霍乱外还有疟疾、痢疾、天花、类霍乱等。^②

表 12 旧志所载上海地区疫病病种

年份	县	病种	疫情烈度	相关描述
1728	金山	虾蟆瘟	2	大疫，乡人名“虾蟆瘟” ^③
1820	南汇	霍乱	2	疫疠大行，转筋霍乱症自此始 ^④
1821	上海	霍乱	3	夏大疫。其证多系干霍乱，手足拘挛，须臾不救，且易传染，有一家丧数口者 ^⑤

① 吴馨修，姚文楠等纂：民国《上海县续志》卷 28《杂记一·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 2777 页；吴馨等修，姚文楠纂：民国《上海县志》卷 1《纪年》，“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 2878 页。

② 参见余新忠：《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 年第 5 期。

③ 博润修，姚光发等纂：光绪《松江府续志》卷 39《祥异志》，“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第 10 册，第 1060 页；常琬修，焦以敬等纂：乾隆《金山县志》卷 18《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金山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286 页。

④ 金福曾等修、张文虎纂：光绪《南汇县志》卷 22《杂志·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南汇县卷，第 983 页。

⑤ 应宝时等修，俞樾等纂：同治《上海县志》卷 30《杂记一·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 2142 页；陈方瀛修，俞樾纂：光绪《川沙厅志》卷 14《杂志志·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川沙县卷，第 393 页。

(续表)

年份	县	病种	疫情烈度	相关描述
1821	嘉定	蜘蛛瘟	2	手足麻木,筋脉挛缩,俗名蜘蛛瘟。或一家死二三人,死者身有红印云 ^①
1890	上海	霍乱	1	时疫流行霍乱症,多猝不及救 ^②
1890	嘉定	霍乱	1	霍乱症流行 ^③
1890	宝山	霍乱	3	流行霍乱症,俗称瘟螺痧,染者多猝不及救,樵肆为空 ^④
1901	嘉定	喉痧	1	喉痧症流行 ^⑤
1903	上海	红痧	2	大疫,多患红痧 ^⑥
1903	宝山	红痧	2	多疫。染者多发红痧,不能透泄者辄死 ^⑦
1903	嘉定	红痧	2	大疫,红痧症流行 ^⑧
1910	上海	鼠疫	1	租界鼠疫流行 ^⑨

出现频率最高的病名是霍乱,其最早出现时间是1820年,爆发于南汇县。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出版的《上海通志》认为“清道光元年(1821),霍乱传入中国,波及上海”“霍乱记载始于清道光元年(1821年)”^⑩,但光绪《南汇县志·杂志·祥异》即已明确记载“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疫疠大行,转筋霍乱症自此始”^⑪。关于“转筋”,《金匱要略》提出“转筋之为病,其人臂脚直,脉上下行,微弦”^⑫,即指局部筋肉痉挛抽搐。“霍乱”之病名,中

① 程其珏修、杨震福等纂:光绪《嘉定县志》卷5《赋役志下·祀祥》,“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第1959页。

② 吴馨修,姚文楠等纂:民国《上海县续志》卷28《杂记一·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2777页。

③ 陈传德等修,黄世祚等纂:民国《嘉定县续志》卷3《赋役志·灾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第2808页。

④ 张允高修,钱淦等纂: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7《杂志·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宝山县卷,第1098页。

⑤ 陈传德等修,黄世祚等纂:民国《嘉定县续志》卷3《赋役志·灾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第2808页。

⑥ 吴馨修,姚文楠等纂:民国《上海县续志》卷28《杂记一·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2777页。

⑦ 张允高修,钱淦等纂: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7《杂志·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宝山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99页。

⑧ 陈传德等修,黄世祚等纂:民国《嘉定县续志》卷3《赋役志·灾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第2808页。

⑨ 吴馨修,姚文楠等纂:民国《上海县续志》卷28《杂记一·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2778页。

⑩ 《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通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056、5060页。

⑪ 金福曾等修、张文虎纂:光绪《南汇县志》卷22《杂志·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南汇县卷,第983页。

⑫ 张仲景著,何任等整理:《金匱要略》,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第73页。

国古已有之,《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灵枢·经脉》均有提及^①,《伤寒论·辨霍乱病脉证并治》亦载:“呕吐而利,此名霍乱。”“病发热头痛,身疼恶寒吐利者……此名霍乱。”^②古时霍乱病,即指上吐下泻,并无强烈的传染性。但结合1820年“疫疠大行”,复见霍乱吐泻造成的转筋症状,可以判断为真性霍乱。关于霍乱病传入中国的时间,相关研究已基本形成共识,也关注到《光绪南汇县志》这一记载,均认为1820年霍乱已传入中国,是年南汇县的记载亦是真性霍乱。^③因此,这一记录可将《上海通志》关于霍乱的记载向前推移一年。

喉痧,又称烂喉痧,相当于西医所谓“猩红热”,症见恶寒发热、咽痛红肿、软腭黏膜内疹,继而全身皆见鲜红皮疹,疹出尽后身热减退,退疹后脱屑。该病由化脓性链球菌感染所致,患者及带菌者是主要传染源。1910年嘉定县见该病,1903年嘉定、宝山、上海两县又见“红痧症”,一般没有明确的“红痧”病名,但根据“染者多发红痧,不能透泄者辄死”的症状记载,可以认为“红痧”亦即喉痧。

“大灾之后有大疫”,无论自然灾害还是社会灾害都会带来物资保障不足、生活环境污染、卫生条件恶化甚至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等种种问题,为邪疫滋生、疫情爆发提供条件。因此,疫情往往成为各类灾害的次生灾害。相关研究也提出,疫情受自然灾害、环境污染和战争等影响和制约,存在10多种灾害链。^④

按旧志记载,上海地区亦见涝、旱、风、雹、寒、热、地震、虫、饥和兵寇等灾害与疫情交互出现。由于这些灾害影响范围较大,可从整个上海地区入手,以年为单位,剔除发生在每年疫情之后的灾害记录,保留发生在当年疫情之前或与疫情同时发生,以及没有明确月份记载的灾害记录,得出上海地区1454—1910年间63个疫年内各类灾害发生的年数,详见表13。

表13 疫年内其他灾害发生情况

灾害	涝	饥	旱	风	震	寒	雹	虫	暑	兵寇
年数	21	12	9	8	7	6	4	2	1	2
百分比 (/疫年数)	33.30%	19.00%	14.30%	12.70%	11.10%	9.50%	6.30%	3.20%	1.60%	3.20%

进一步考察各类灾害之间的关系,表明与疫情同步出现或在疫情稍早出现最多的灾害是涝灾和饥灾。实际上,这两者也是导致疫情爆发的主要灾害。

涝灾往往污染环境、滋生邪戾,进而诱发疫情;严重涝灾会直接导致人和动植物大量死亡,

① 参见佚名著,田代华等整理:《黄帝内经素问》,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第170页;佚名著,田代华等整理:《灵枢经》,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② 张仲景著,何任等整理:《伤寒论》,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

③ 参见罗尔纲:《霍乱病的传入中国》,《历史研究》1956年第3期;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单丽:《从方志看中国霍乱大流行的次数——兼谈霍乱首次大流行的近代意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1期。

④ 参见孙关龙:《中国历史大疫的时空分布及其规律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04年第6期;张业敏:《明清山东瘟疫与社会——基于医疗社会史的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26—31页;张丽芬:《明代山西疫灾特点及救济措施述略》,《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单联喆:《明清山西疫病流行规律研究》,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43—48页。

如果处置不及时就会滋生病菌，催生疫病，形成疫情。

饥灾更为特殊，它可能是自然减产造成的原生灾害，也可能是其他灾害引起的次生灾害——涝、旱、风、雹、寒、热、虫、地震等自然灾害和兵寇之类社会灾害均会导致粮食减产，进而带来饥灾。饥饿会使受灾人群身体素质下降，抵抗力减弱，容易染受疾病；严重饥灾更会直接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如果对尸体火化、掩埋等处置不力就会诱发瘟疫。实际上，饥灾发生时，无论官与民，都无力关注果腹以外的事情，是以疫情常与饥灾同时产生。

此外，旧志关于兵寇与疫灾并见的记载虽较少，但也值得关注。明嘉靖十八年（1539），嘉定县遭崇明王祥、王崑之乱，官军征剿良久方平，继而出现大疫。^①又如明崇祯十五年（1642），崇明县大饥，树皮、草根均遭食尽，路上死者相枕藉，在此大饥之年又逢大寇，继见大疫。^②与其他自然“天灾”不同，兵灾寇祸属于“人祸”，是纯粹的社会性灾害，对疫情期间民众互助组织和相应社会生态的破坏更甚于天灾。

表 14 疫年内其他灾害并见情况

同一疫年并见其他灾害种类	0	1	2	3	4	5	总计
年数	28	14	10	7	3	1	63

事实上，疫情并不由单一的其他灾害催生。分析疫年并见其他灾害的情况，发现有 37 个疫年发生了其他灾害，且其中有 22 个疫年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其他灾害并见，详见表 14。旧志中记录的疫情也往往伴见多种灾害，如明景泰甲戌年（1454）正月，连续 40 天大雨雪，平地积水数尺，气温也大幅度下降，湖泖全部结冰。夏季又遭大水，淹没庄稼；进而发生大疫，大量人口死亡。^③又如清光绪七年（1881）六月二十、二十一日，大风掀起树木，禾苗自然也受损害；当年闰七月初四，又发生大风雨，海水泛滥，导致大量农作物被淹；十二月初三日，竟然和仲春时节一样温暖^④。总之，全年气象异常，极端天气较多，造成“疫且饥”的后果。

余 论

经过前述分析，可以发现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疫情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明清上海地区疫情频发，平均 7 年就有 1 次疫情，且总体呈现越来越频繁的趋势。疫情往往发生在夏秋季节，以农历六、七月为主。第二，从空间上看，发生疫情的地区重心在县域层面从华亭县—上海县区域迁移至上海县—嘉定县区域。第三，明清上海地区疫情烈度总体较高，“大疫”占 6 成以上，“特大

① 参见韩浚修，张应武等纂：万历《嘉定县志》卷 17《杂记考上·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第 339 页。

② 参见朱衣点修，吴标等纂：康熙《崇明县志》卷 7《侵祥志·侵祥》，“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崇明县卷，第 253 页。

③ 参见陈威修，顾清纂：正德《松江府志》卷 32《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第 1 册，第 493 页；聂豹修、沈锡等纂：正德《华亭县志》卷 16《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第 224 页；郑洛书修，高企纂：嘉靖《上海县志》卷 6《杂志》，“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 141 页。

④ 参见吴馨修，姚文楠等纂：民国《上海县续志》卷 28《杂记一·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 2776 页；于定等修，金咏榴等纂：民国《青浦县续志》卷 23《杂记上·祥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青浦县卷，第 2063 页；陈传德等修，黄世祚等纂：民国《嘉定县续志》卷 3《赋役志·灾异》，“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第 2807 页。

疫”占一成多。疫情烈度的重心亦有从华亭县—上海县区域向上海县—嘉定县区域迁移的特点。第四，明代未见上海地区具体疫病名称记载；清代后期始见，具体病种以霍乱和红痧为主。第五，上海地区疫情常与其他灾害并发。

把视野拓展到江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则可以发现上海地区疫情既与全国和江南地区的疫情特点相呼应，又有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带来的个性特点。

在时间上，相关研究发现我国历史疫灾主要在夏秋季节流行，疫灾频度和疫灾强度具有长期上升趋势，且明中叶至民国疫灾极频繁。^①具体到明清，明代至少有168个年份发生过疫灾，单独发生的疫灾达330多次；清代疫灾先缓慢减少，而后逐渐增长。^②就江南地区而言，明代嘉靖、万历、崇祯3朝疫灾高发，以夏秋季节为疫灾多发期；清代康熙、乾隆、光绪3朝为疫灾群发期，夏秋季节同样是疫灾多发期。^③上海地区疫情的时间分布与这一规律基本吻合，图1的第1个小高峰基本对应明代嘉、万、崇时期，康、乾、光3朝也各有一个10年疫灾指数偏高的时期。

空间上，全国宏观上的疫灾重心点在宋元以前由北向南迁移，在宋元以后由东向西迁移。^④上海地区作为全国的“偏南”和“正东”，其地疫情越来越频繁、大疫越来越多，实际上是承接疫灾重心迁移的结果。聚焦到江南地区来看，明代疫区与太湖水系关系密切，疫灾重心在苏州、湖州、松江之间的三角地带，疫灾最重的县是南直隶吴县。^⑤吴县与上海地区颇为接近；而以松江府城为顶点计，该三角地带至少覆盖了上海地区的华亭、青浦两县。同时，府级城市疫灾多于县级城市。^⑥清代疫灾则呈现以上海为中心，由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地区逐级递减的空间特征。^⑦清代早期，疫情高发地为吴县、嘉定、华亭、娄县、奉贤，中期为江宁、杭州府和苏州—嘉善—宝山所形成的三角腹地，该三角腹地包括了青浦县和嘉定、上海、华亭、娄县的部分地区，后期以上海、嘉定、青浦、嘉善一带以及江宁、常熟县为主。^⑧由此可见，上海地区始终为江南疫情的重灾区。

疫灾重心变迁受经济重心变迁的牵引，人口稠密区、交通沿线区、城市周边区、自然疫源区是疫情频发区。^⑨实际上前三者密切相关，交通沿线、城市周边往往是人口稠密处，人口稠密往往引发疫情。上海疫区重心与人口重心、经济重心的变迁，也印证了这一点。查阅各部旧志中的户口资料，得出旧志所载上海地区历代分县人口数据，其中华亭、上海两县人口对照如图8所示。图中华亭、上海两县人口折线呈U型，且左高右低。其原因是U型底部的相应数据仅指男

① 参见龚胜生、李孜沫、谢海超等：《中国3000年疫灾流行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地理学报》2021年第8期。

② 参见林欣华：《明代疫灾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4—16页；刘开心：《清代疫灾时空分布特征及其与交通的关系》，广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第18页。

③ 参见龚胜生、王晓伟、张涛：《明代江南地区的疫灾地理》，《地理研究》2014年第8期；王晓伟、龚胜生：《清代江南疫灾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3期。

④ 参见龚胜生、李孜沫、谢海超等：《中国3000年疫灾流行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地理学报》2021年第8期。

⑤ 参见龚胜生、王晓伟、张涛：《明代江南地区的疫灾地理》，《地理研究》2014年第8期；张涛：《明代疫灾时空分布及环境机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97页。

⑥ 参见龚胜生、王晓伟、张涛：《明代江南地区的疫灾地理》，《地理研究》2014年第8期。

⑦ 参见刘开心：《清代疫灾时空分布特征及其与交通的关系》，广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第27—28页。

⑧ 参见王晓伟、龚胜生：《清代江南疫灾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3期。

⑨ 参见龚胜生、李孜沫、谢海超等：《中国3000年疫灾流行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地理学报》2021年第8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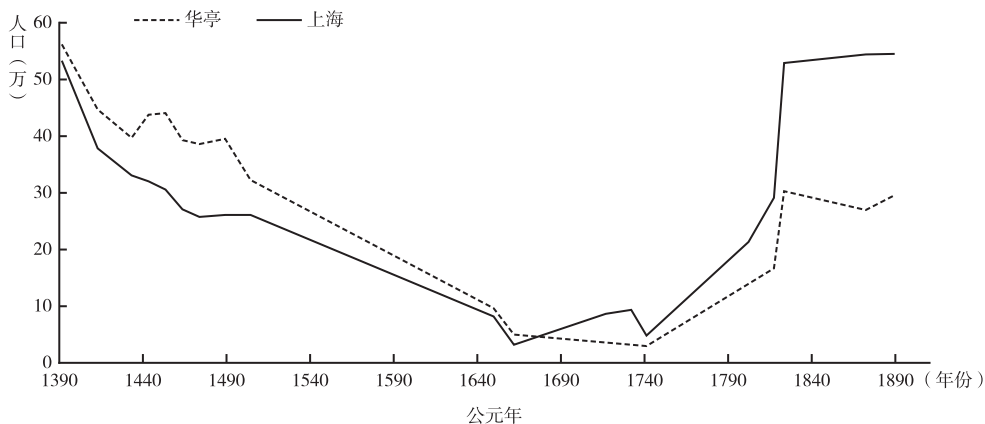


图8 华亭、上海两县人口对照

丁数，未载全部人口，故较其他数据为少；而左高于右是因为折线起点系元代华亭初分上海县之际，其时松江府仅华亭、上海两县；折线终点为清末，其时松江府已有8县（厅）。其间华亭县经历了分立青浦、娄县、奉贤3次分县，上海县也经历了分立青浦、南汇、川沙抚民厅3次分县。两县面积均较前减小，才导致此种数据现象。图9还提示：在明代，作为区域政治中心的松江府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牵引作用较各县城更为显著，府城所在地华亭县也因此成为人口重心、经济重心，同样也是明代疫情较多的县域。但这一中心未能长期维持下去，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上海开埠。华亭、上海分置之后，在较长的时间内华亭县人口一直多于上海县，但在17世纪后半叶开始被上海县反超，直至19世纪相距悬殊，一直维持到清末。经济上，19世纪后半叶上海县已取代华娄地区成为松江府乃至江南经济中心。^①可见，19世纪开始上海地区的人口重心、经济重心已逐渐转移到上海县。同时，疫区重心也随之从华娄一带迁至上海县。

诸县中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即崇明县的疫年比一直最低、疫情烈度也偏低。是否存在该县旧志将疫情记录脱漏的可能？检阅各部《崇明县志》，所见最早县志系明正德年间所修，此后万历年间及清康熙、雍正、乾隆、光绪，乃至民国年间均有修撰，总体修志比较完整和成熟，各部旧志中均有“祥异”类内容，当不至于遗漏重大疫情，因此可以认为该县确实疫情相对较少、烈度较低。其中当有多种原因，但崇明县特殊的地理位置或与该县少疫有较大的关联。大江阻隔，今人虽有过江桥隧修尚且感到不便，何况古时的交通条件？地理上的孤岛直接形成了疫情传播中的安全“孤岛”。从这个角度来说，物理隔离确能阻断疫情传播，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不可或缺；同时，这也从反面印证了疫区重心随人口、经济重心迁移的结论。

（作者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党委宣传部；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

本文责编：杨卓轩

^① 参见李伯重：《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看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